

78
= (1907)

凡识 閱 著 仁 雷 德



行 發 社 學 授 函 語 界 世

柴門霍甫評傳

德雷仁著
閔凡譯

世界語函授學社發行
CHUNGKING 1945



世界語創始者 Dr. L. L. Zamenhof

柴門霍甫評傳

目 錄

世界語創始者柴門霍甫像

作者略傳

1 柴門霍甫及其世界觀

柴門霍甫的童年.....	2
世界語主義的內在理想.....	7
人類一員主義.....	10
柴門霍甫與民族主義及沙文主義（卹山主義）.....	13
柴門霍甫的宗教觀.....	16
托爾斯泰與柴門霍甫.....	18
柴門霍甫觀念論的矛盾.....	21
柴門霍甫的人格.....	23
柴門霍甫的最後悲劇.....	24

2 國際語創始者與理論家

的柴門霍甫

柴門霍甫童年的世界語理想.....	28
兩個原則——合理文法與國際化字彙.....	30
柴門霍甫堅毅的努力與試驗.....	32

466343

世界語的黏合性.....	34
作為語言學家的柴門霍甫.....	35
語言創造的集體主義.....	37
柴門霍甫與世界語改造運動.....	40
語言形式的創造者及文體家的柴門霍甫.....	42
科學界及政府當局對於接受世界語之可能的任務.....	44
柴門霍甫關於促進世界共同語事業的理想.....	47
語言的實際應用及世界語者的增多.....	48
世界語者的語言統一性.....	53
柴門霍甫在國際語運動中的職務.....	54

作者略傳

E. 德雷仁 (Ernest Drezen) 是蘇聯的工程師，拉特維亞族人。1892 年生於拉特維亞之利巴雅，求學於喀琅斯塔得之職業學校及彼得格勒之技術專科學校。1918 至 1921 年間，曾在紅軍中擔任各種工作。1921 至 1924 年服務於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1924 年後則從事於科學方面之研究，如合理化的勞動組織及語言學等。1926 至 1930 年任郵電學會之總幹事，以後歷充 Orgenergo 托拉斯的經理，業務管理技術出版部之特約編輯，莫斯科大學以及其他高等技術學校的教授，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委員等等。1910 年起參加世界語運動。1917 至 1919 年為聖彼得堡著名世界語團體「希望社」之主席。1921 年在彼得格勒舉行的全蘇第三次世界語者代表大會中，他被選為當時成立的蘇聯世界語者聯盟 (SEU) 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從那時起他一直是全蘇世界語運動的指導者與推動者。他關於世界語的主要著作，除本書外，有：唯一而材料空前完備的「萬國語通史」(Historio de Mondlingvo)，裏邊詳細敘述每一個較為著名的萬國語方案，『世界語運動分析史』(Analiza Historio de E Movado) 『世界語理論概要』(Skizoj pri Teorio de Esperanto) 『國際語形成及推廣之路』(La Vojoj de Formiĝo kaj Disvastiĝo de la Lingvo Internacia) 等書。

I

樂門霍南及其世界觀

柴門霍甫的童年

世界語創造者柴門霍甫博士 (D-ro Ludoviko Zamenhof) 的特性、思想方式和整個人格，當他的童年時代，在以十九世紀後半的帝俄和它的西部為特色的社會和政治、經濟條件的影響之下就已形成了。

L·柴門霍甫是 1859 年十二月十五日誕生於比亞里斯托克 (Bialystok——在華沙東北——譯者)。父親母親都是希伯來人。

比亞里斯托克的居民，百分之八十是希伯來人。其餘百分之二十則屬於俄羅斯、波蘭及日耳曼各民族。

帝俄對於西部——特別在所謂波蘭王國境內的一般政策，是挑撥各民族間的情感，使他們相互攻擊。而那些自己民族生活與民族文化在壓迫下不能自由發展的波蘭人和希伯來人，則以相互敵對的行為來幫助這種壓制。其中最受苦難的，自然是希伯來人了。

在 L·柴門霍甫的幼年 (1863—1865)，曾爆發了最近一次的波蘭革命。它是殘酷地被帝俄的憲兵與軍隊壓平了。

在這種一般的環境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L·柴門霍甫的父親M·柴門霍甫（Marko Zamenhof），他在比亞里斯托克辦有私立學校，獲得了政府機關的位置。他在國立中學內擔任了教師的職務。這在希伯來人中是不多見的事情。

1873年M·柴門霍甫和他的家庭遷居到華沙（Warsaw），在那裏他擔任了職業學校及獸醫專科學校的德文教師。

很顯然地，M·柴門霍甫在政府及警察當局的心目中，獲有極大的信任。所以在華沙他得到了私人開辦寄宿學校的特許。

政府當局對於發給這樣的特許是非常慎重的。祇有他們認為在任何方面都不致給學生以不良影響的人，才會適准。而希伯來人，却正是被沙皇的政治警察所時刻特別注意的對象。

M·柴門霍甫在政府中所享有的信任，還可以表現在另一件事實上，就是他曾被任為外國書報檢查員。（註一）

1907年，七十高齡的M·柴門霍甫死去了。這時他辭了政府參議的尊銜。（註二）

關於L·柴門霍甫幼年生活之更詳盡的敘述，讀者可參閱本書所引用的柏里華（E. Privat）所著之『柴門霍甫傳』（Vivak del Zamenhof）（註三）。那個書的作者是曾經獲得便利和一切關於柴門霍甫之家族的史料的。

根據各種證明L·柴門霍甫的父親，是一個性情嚴厲

的人，卓越的語言學家和原則地及實際地實施沙皇教育方法的兒童教育家。所以體罰在他的孩子們中間並不是稀有的事情。為着完成在希伯來人間是那樣罕有的政府職務，某種程度的粗暴以及對職務上的要求之嚴格的執行，成為他的必然性格。

母親則和那無神論者的父親剛剛相反是一個溫柔而篤信宗教的女人。

L·柴門霍甫從父親那裏繼承了剛毅與堅執和對於各種科學——特別是語文學研究的天才；而從母親那裏則繼承了——謙遜、鎮靜及對某種能使他的生命高出於一般之上的事物的熱望。在他的每一個同學中間，他享有尊敬與友愛。柏里華證明了在學校裏，『對於功課上的一些困難問題，他是最愛幫助別人的一個顧問。』在家庭裏以及在外邊，L·柴門霍甫都深切地感覺到：由於他那希伯來的祖先和家庭生活條件困難所引起的一些苦惱。為了生活的權利，為了顧慮生活的必需方法，L·柴門霍甫在作學生時期以及在初為醫生時期的奮鬥是困難而艱重的。

在家庭裏，在學校裏以及在比亞里斯托克和華沙的街頭上，柴門霍甫所感受孕育的觀念恰恰是這樣一個在波蘭與希伯來人雜居的波蘭小城民族地、經濟地被壓迫和榨取的小資產階級的觀念。

柏里華在柴門霍甫傳裏是這樣敘述着：『關於勞動者，關於終日勞動的窮苦大眾，中學生的柴門霍甫漸漸地愈加關懷。他愛在家庭中朗誦俄國詩人，尼克拉索夫（Nekrasof）（註四）——這個艱難和困苦之詩人的諷句』；

並且『柴門霍甫生平最親愛的是勞苦的貧民。他寧願離開上流社會，而安居於平民區域之中。』

L·柴門霍甫的兄弟——萊奧諾·柴門霍甫（Leono Zamenhof）在他所寫的一篇小文『柴門霍甫傳記拾零』裏寫道：

『在他的中學時代，各種社會問題，也非常引起他的興趣。

『在他年齡還很幼小的時候，他就夢想着關於這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法，可是其中最使他感到興味的是各種不同民族間的相互關係這一問題。這個問題鼓舞了他企圖從事於中立的國際的語言之創造。』

關於現存的民族及政治壓迫的原因以及民族鬥爭和相互仇恨的真正根源，他的家庭和他周圍的社會都不能給L·柴門霍甫以一種正確的說明。

那當檢查員的父親，並且似乎注意着，不使任何危險思想，滲入到他兒子的頭腦中。而那溫柔的母親，則想以愛與和平的方式去解決一切。

結果，對於這些非常重大的社會問題，L·柴門霍甫企圖以個人的力量去謀解決。他以為種族間相互仇恨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語言的不同。他在很幼小的時候，就得到了這個觀念；等到達到成人的年齡，這個觀念就呈現了日益重大的作用。以後，當他也能夠認識到另外一些更真實的社會的觀念的時候，在他生活裏這主要觀念已經獲得那樣的重要性足以把一切其他的思想都排擠到後面去了。

於是L·柴門霍甫的整個觀念體系，是聯繫到國際語

樹一問題上的。所以關於那些『被咀咒的社會問題』，他從未沒能看到另外的任何解決方法，除了那些把國際語理想置於第一位的方案之外。

L。柴門霍甫這種概念的整體，可以說還有某種好處。似乎只有依賴着它，柴門霍甫才能思致到底，工作到底而使實現國際語的夢想得以成功。

事實上，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在他是永遠被放在副次的地位了。他整個的注意，他整個精神的努力，都被應用在他所認為無限重要的一點上。

L。柴門霍甫認為他是這一理想的先驅者和先知。他預想到會有許多的障礙；可是他相信他這個理想的正確和它的最後成功。

所以他寫道：

『那些新理想的先驅者，除了嘲笑和攻擊之外，不會遇到其他東西的。他們第一次遇到的毫無所知的頑童也會卑視着他們而說他們是在為着一些愚蠢的事情而奔忙。』

並且

『人們會驚異着：在我們這崇尚實際的時代，怎麼會出現這樣愚蠢的空想家呢……』(註五)

可是時間過去了，那昨日還被嘲笑的理想，逐漸地為一般人所接受了。L。柴門霍甫能親自看到這巨大的勝利和重要的接受，假若這種接受不是為了他的社會觀念體系，那麼這時是為了一個實際地為他所解決的國際語問題。

(註一)：E. Privat: "Vivo de Zamenhof" London, 1920, P.28

(註二)：E. Wiesenfeld: "Galeria de Zamenhof" Horram, b. kola, 1924, P.7

(註三)：此書有楊景海先生之中譯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譯者

(註四)：按厄氏為高爾基先生，參閱楊譯(柴門霍甫傳)P.29——譯者

(註五)："Fundaments Krestomatio (以後簡稱 F. K.) P. 269.

世界語主義的內在理想

L·柴門霍甫所提議而堅決主張的國際語方案，是被世界上所接受了。

可是在一開始他就密切地和他的語言連繫着的社會理想却失敗了。

1878年當幾個中學同學開會慶祝這個國際語的最初形式的創造時，大家就曾唱出：

「各民族的仇恨，

倒了吧，倒了吧，現在時候到了！」……

在1900年提出於法蘭西科學促進會的報告中。L·柴門霍甫申述着國際語的可能性，同時屢次駁斥着他所認為由於語言不同而產生的莎文主義(Sovinismo)。

他衷誠地努力想使那些莎文主義者相信：愛自己的人民與全人類是和愛自己的家庭與自己的國家，有着同樣關係的。(註六)

1907年在劍橋(Cambridge)的第二次萬國世界語者

大會上，柴門霍甫特別強調地說：

『我們想要創造一個中立的基礎，使各民族的人民得以和平地博愛地相互溝通，而不致以自己民族的特有物來互相侵犯。』

在他提交倫敦的萬國人種大會（1911年七月26—29日）的論文中，他肯定着種族間相互仇視的原因，不是經濟的：

『我們仇恨外來的種族，並不是害怕他們會以經濟的力量來吞併我們，而我們之所以嚮着吞併，正是因為我們仇恨他們。』（註七）

L·柴門霍甫論文內的中心主張說『不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種族間的仇恨』無疑地是錯誤了。因為它恰恰是這個原因造成的。各民族的金融家與企業家的經濟競爭，經常地是被表現為民族的與種族的競爭的。同時那些剝削階級更在社會的諸下層階級中靈巧地組織着種族的仇視。因為在這種烟幕下，更便於他們對諸下層階級的剝削，而且可以削弱那些被榨取階級組織反抗的力量。

L·柴門霍甫在一九一三年肯定着『語言的莎文主義是造成人類間互相仇視的重要原因之一』（註八）也是同樣錯誤的。

在這句話裏他倒果為因了，因為莎文主義的本身是現代社會關係的後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這種對於種族與語言問題的過度誇張，雖然不為從事於社會改造的嚴肅工作者與戰士所接受，却正是這新語言的第一期先驅者們的主要理想，這是和謠言一同接受過來

而作為指導原理的。

圍繞着這個理想，聚攏了一些初期世界語者。而且這個理想就成為聯繫他們的中心。

L·柴門霍甫受了他的理想的鼓舞與幫助，才給與了世界語 (Esperanto) 以一個原則的草案，在這基礎上世界語才能以開始和發揚。和這同樣地，『世界語的內在理想』也鼓舞了那些初期世界語者們為世界語而鬥爭，使用它並且藉此引導世界語到那樣完美的程度，使那些把語言僅僅當作簡單的工具而拋棄了 L·柴門霍甫社會觀的廣大人群們也可以拿來應用了。

被自己的理想所蒙蔽的 L·柴門霍甫，常常不能看出自己的主張和現實生活中間現存的矛盾。

1910年在華盛頓舉行的第六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的演詞內，他用以下的語句來向美國致敬：『你這自由的國家，你這將來有無限光明的國家……』

『這一個不屬任何一個種族或任何一個教派的國家』。L·柴門霍甫是過度地為這個想像所眩惑了。他忘記了那數百萬正在被迫害，被榨取的黑人了。

他忘記了，那宗教的以及語言的沙文主義和在歐洲是同樣茁發怒放著(不過或許在另一種形式下)。因為美國的社會體系和歐洲比較起來，實在沒有什麼重要的差別呀。

是的，此後一年，在他致萬國人種大會的備忘錄中，L·柴門霍甫對於社會糾紛的其他原因，已經作了幾項保留了：

『種族間紛歧與仇視，只有在全人類有一個共同的話

言和一個共同的宗教的時候，才能完全消滅……

『那時候人類中間的各種糾紛，像現在流行於每個種族與國家內部裏政治、黨派、經濟、階級的各種鬥爭或者還會繼續着，可是那些糾紛裏面最恐怖的種族仇視，却要完全消滅了』。(註九)

可是即使在這個備忘錄中，L·柴門霍甫也沒有一個字提到語言本身是某種社會，某種社會生產和某種生產形式的產物。他那和矜驕的『世界語內在理想』形成不可分離的語言理想，在他的精神活動中，超越了他其他的一切。

在 1912 年第八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 (Krakow) 他的最後的正式講演中，L·柴門霍甫重新明確地強調着：『世界語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語言，他並且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註六)：P. K. P. 274—276.

(註七)：Z. "Gentoj k Lingvo Internacia" Leipzig, 1912, P. 4

(註八)：Dro L. L. Z. "Deklaracio pri Homaranismo" Madrid, 1913, P. 1

(註九)：同註七 P. 11—12

人類一員主義 (Homaranismo)

在他的『人類一員主義宣言』(1913年)中，柴門霍甫自己也承認：『世界語主義的理想只表現了一種模糊的

博愛的情感和希望……這些情感與希望是由於在中立語的基礎上相互接觸而產生的。』

但是他願意相信：國際語已經創造了一些信徒們準備着接受某種表現更為明朗的哲學倫理的原則。

第一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給予他以一種這樣的提示：

『人類各民族的份子，在布倫（Bulonjo sur Maro）現在是真正走進了更廣大的相互諒解與友愛了。』

他以為世界語以及它的內在理想，已經開始統一人類成為『一個家庭的組合——因為我們看見無數熱情的世界語的朋友在我們的面前，他們幾乎代表着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以及人類中的各種身分與階級。』

這些話就是他階級和協觀念的具體表現。在初期世界語者的小集團內，短短的一個星期的聚會，在世界大會中立的基地上，這種『階級和協』也或許有實現之可能，但是無疑地，無論現在或將來，沒有任何一種語言，任何一種內在理想，在人類共同生活、權取和勞動的一般條件之下，能夠實現這樣的階級和協。

一年以後，L·柴門霍甫追念着布倫大會的那些日子寫道：『布倫大會驚人的成功，向人類一員主義的創始者們證實了在人類中間，實現絕對的正義平等與博愛是完全可能的。』（註一〇）

所以他決定建立一個更為明朗的哲學的社會運動『人類一員主義』以代替那意義朦朧的世界語主義。

在同書第六頁上，L·柴門霍甫解釋人類一員的主要

目的和信念為：『人類一員主義的份子們，相信一切民族的宗教的莎文主義，以及一切以荒謬與武力為根據以一個民族統治其他民族的企圖，或遲或早地是一定要被消滅的。』

在這些句子裏，他也同樣缺乏對於事實的了解，也或者是故意避開這樣的事實，那就是莎文主義的消滅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現代在上階級壓迫與榨取在下階級這一社會體系的消滅。

人類一員主義的基礎精義，可以 1913 年『人類一員主義宣言』中之第一、第二兩要點為具體表現。

『我把人類全體當作一個家庭來看待。人類之陷於各種相互仇視的民族與宗教公社的分離，我認為那是最大不幸之一。』還有：

『一切對人的觸犯與壓迫，僅僅為了對方和我是屬與不同的種族，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宗教以及不同的社會階級，我認為是一種蠻性。』

很值得注意的是：L·柴門霍甫在這個宣言的第一版（註一一）中，沒有『以及不同的社會階級』這幾個字。

在 1906 年至 1913 年的中間，L·柴門霍甫的思想，漸漸考慮到階級差異這個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了。

可是，當 L·柴門霍甫知道了這種重要性的時候，他不願而且不能重新研討他自身觀念的正確性。他把階級的差異，並列在種族、語言以及宗教的差異旁邊。而且他以為由這些差異而起的一切罪惡，都可由接受一種共同的語言和人類一員主義者的世界觀來解決了。

L·柴門霍甫這些只能使對於現存社會力的真實認識

更為紊亂的觀念，是需要以最大努力駁斥的。

可是L·柴門霍甫由於他的信條而引伸出來的幾個次要的實際的結論，却是值得贊揚和接受的。

在『人類一員主義宣言』（1913年）的第四要點中，L·柴門霍甫寫着『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省份，都應當冠以中立的地理名稱，而不用任何種族的名稱。』

恰好只有在對任何民族，任何人民實現了更廣大自由的蘇聯，才實際地把這個原則導入應用了。如：蘇聯（USSR），西北區（Nord-okcidenta lando），烏拉爾區（Urala lando）等等。

同樣地，L·柴門霍甫在宣言的第五項中所提議的非莎文主義的兒童教育，也恰恰在蘇聯所謂『國際教育』特科中實現了。在其他國家除了校內也添設了關於國際聯盟的特別課程，而自稱實現了L·柴門霍甫的這個理想的。

在蘇聯同樣被接受的是關於父母語和本身語（即日用語）觀念的原則的區別。（註一二）

（註一〇）：“Homaranismo (Hilelismo)”, Peterburgo, 1906, p. 5

（註一一）：“Dogmoj de Hilelismo”—Peterburgo, 1925 p. 13—14

（註一二）：參閱楊“柴門霍甫傳” p. 101—102——譯者

柴門霍甫與民族主義及 莎文主義（卍山主義）

事實上，對同種人民和他們的不幸的思念是引起L·

柴門霍甫自己走向國際語理想和世界語主義內在理想的原因。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證明，就連國際語，他起初之所以想創造『第一而且主要地是為着那些被分散在各國而說着各種語言的和自己同種的不幸的人們，他們藉着國際語的力疊，可以重新統一起來。』（註一三）

在他作學生的某個時期，他曾經很努力地從事於希伯來人在烏克蘭殖民問題的研究。……

『他曾幻想着巴勒斯坦。那時候，他寫了許多詩和宣傳的文章。』

『第一次耶山主義者（註一四）大會，在華沙開會的時候，他曾經有一篇很動人的演說，使他在有關的範圍內，非常馳名。』（註一五）同樣的事實，柏里華也敘述過。（註一六）

可是L·柴門霍甫慢慢地了解了：耶山主義，不過是同樣民族沙文主義的另一形式。這是他從幼年以來就以全部精神來厭惡着的東西了。

L·柴門霍甫捨棄了耶山主義以後，也未能接受那些言行相符合的化論者（Konsekvencaj asimilistoj）的理想，他們代表着一部分生活良好的資產者希伯來人的觀念形態。他們希望以整個同化希伯來民族於所在民族內的方法來激成解決希伯來的問題。

他願意保守着他的『中立的超民族的人類一員主義』純潔而無瑕。

關於向民族壓迫的原因作積極鬥爭的話，在L·柴門

霍甫的演說中是不曾見過的。僅僅在『人類一員主義宣言』的第八項內有一些自慰的語句：

『假若在我的國家內，一切勞動是被一個特殊民族為了利便與榮譽而榨取着，並且這麻痺了我對社會工作的熱情，或者甚至壓迫着我幻想另一個國家，那我不應當失望，而必需要以這樣的信念來自慰，就是這種非常態的狀況，在我國內遲早是會過去的。』

這個溫和的被動的希望，在國化論者看來，是不夠具體的。而對於那些想組織被壓迫的人民們為民族及國家形式的積極的卹山主義者，也同樣地不能接受。

L·柴門霍甫想藉以為其同種人民服務的理想，始終沒有為他們所接受。

1914年六月三十日，L·柴門霍甫拒絕了參加希伯來民族聯盟的建立。對於這個聯盟的發起者，他寫過如下的信：

『依據我自己的信仰，我不能自附於任何特殊的民族或宗教的意向與理想。

『我深信任何國家主義所能貢獻於全人類的，不過是最大的不幸而已，並且我還深信一切人的目的，應該是「創造一個和諧的人類」。當然，被壓迫民族的國家主義——作為一種自然的自衛行動——是比較壓迫民族的國家主義，值得原諒的多；但是如果強者的國家主義是卑劣的，那麼，弱者們的國家主義，也不見得怎樣高明了。……我只願為了人與人間之絕對正義而努力。』（註一七）

他願意相信：『以這樣的方法比以達到國家主義的企

國，我可以帶給我們不幸的民族以更多的好處。

(註一三)：參閱 O. D. Ribault “Rememorajoj pri la unua tempo de esperanto” en la “progreso”, Praha, 1927, N. 3. p. — 13.

(註一四)：參閱楊譯“柴門霍甫傳” p. 41——譯者

(註一五)：E. Wilsenfeld “Galerio de Zamenhofo” Horren, bei Kofn, 1924, p. 13.

(註一六)：參閱楊譯“柴門霍甫傳” p. 41—43.——譯者

(註一七)：參閱楊譯“柴門霍甫傳” p. 178.——譯者

柴門霍甫的宗教觀

在他所看到的現實生活和玄學地建築起來的人類一員主義的理論中之不可避免的矛盾，使柴門霍甫感到他自己的弱點，而走向對某種宗教或似宗教的接受。

L. 柴門霍甫在第一次世界者語大會所宣讀的『在綠星旗下的祈禱』中，他談到了上帝，認為是一種未知的強大力量，一種神祕的統治世界的力量。

在人類一員主義宣言第十項中，他也講到上帝，以為『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至高無上的力量。』

對於人類社會的創造力，他仍然是不了解，而且也不能了解。所以對於他所要走的那些道路的正确性，就缺乏堅定的認識。

對於這種認識的不足，他代以宗教的——確實高貴化、觀念化了的——信仰。

人類一頁的教堂是他曾熱望着創立的，在那裏面，他建議廢除那些祀神的儀式，而代以傾聽：『那些人類大哲的作品，關於生，關於死，關於我們的「小我」和宇宙與永恆的關係。』（註一八）

L 柴門霍甫不願意知道，可是無疑地他曾感覺到：他的哲學觀完全不能適應於現實生活。他不敢絕對地相信他所設計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是可以給現存社會秩序中的一切不良現象以一個滿意的解決。

在他，對於自己著作的自信的進一步保證，就是對那種不可知力的信仰。這種力是為那些深刻了解人類歷史真實過程，和了解影響這個過程的實在力量的人們所忽視而不需要的。

L·柴門霍甫希望其他的人們不要重蹈那猶豫與幻像追求的悲劇，像他在十六歲時一個幼年無神論者所經歷過的一樣，那時他幻想到人類的福利，而沒有關於人類進化之路的正確觀念，因此為着拯救他那唯心論的概念體系，他必須復歸於上帝和宗教。

L·柴門霍甫希望着：

『從混亂中，同時也從再陷於種族宗教的莎文主義危機中來拯救出自己的後世。』

顯然地，L 柴門霍甫在大戰中為計劃中的中立人類宗教大會所準備的發起書，已經缺乏有說服力量的聲調，而僅是空虛地底召着了：

『小孩子是不能用抽象的理論與法則來培養的。他需要的是印象和觸摸得到的外物……無宗教者的孩子，其苦

惱常是何等的酷烈啊！他見到其他的童兒，縱極貧窮，但心中快樂地走進教堂。而他自己却沒有任何教導的規律，沒有任何的節日，沒有任何的習俗。……』(註一九)

事實上，給予兒童的指導規律，是可以完全脫離宗教教育而獨立的。不過教育、指導的規律、節日以及所樹立的習俗是必需給兒童們以明確的意志，堅實的知識以及對於生活的確信。

在蘇聯，非宗教教育所給予兒童的真實的生活原理，比之各種教會任何教義所能夠給予兒童的更多。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這些蘇聯的兒童們，在意志、知識和確信上是會發展為，而且會是真實而有價值的人類一員的。

對於兒童與青年時代的 L·柴門霍甫，是缺乏這種知識與確信的。而他所具有的意志，却把他導入於虛偽的造作的，觀念主義者的理論中。

(註一八)：“Homaranismo” (Hefelismo), Peterburgo, 1906 P. 15

(註一九)：參閱楊譯柴門霍甫傳 P. 168

爾斯泰與柴門霍甫

L·柴門霍甫的理想，關於樹立和平以代替現存於人類種族階級間的相互鬥爭與迫害，是和俄羅斯的偉大作家 L·M·托爾斯泰的所曾經表現的同樣思想是具有某種關聯的。

柏里華曾經敘述過：『經過光輝的文藝生涯之後，這

豪富的伯爵，竟轉向於 L·柴門霍甫自童年以來所經驗着的同樣理想。……(註二〇)

托爾斯泰和柴門霍甫同樣地明瞭現存社會秩序的罪惡。托爾斯泰也和柴門霍甫同樣地不能瞭解指導人類種族社會進步的法則。他們從現代社會的罪惡中來找尋出路，結果都陷入於觀念論的泥沼了。

這兩種主義——托爾斯泰主義和人類一員主義，都是對現代文化形式的抗議，對現存社會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的抗議。

但是 L·柴門霍甫沒有像托爾斯泰所具有的那樣勇敢與論斷。

托爾斯泰曾作過有力的號召，使復返於自然生活，燬棄現代的文化，完全而自然地中止人類的存在。

托爾斯泰達到了最終的邏輯的結論。他寫道：『人類不僅沒有權利來藉着鐵路、汽機、電氣、電話、照像以及無線電事業以營利，就是藉着簡單的鋼鐵的製造，也是同樣地沒有權利。因為這一切的創造與完成，現在是僅僅用於享受、淫樂、情慾的創造和人類的毀滅。』(註二一)

托爾斯泰本質地表現了反動的地主階級的觀念。這一階級是正被現代生產方法的迅速進步，投入於毫無出路及日益深化的窮困與失望中。

L·柴門霍甫在中途就停止了。他不曾而且不能達到最終的邏輯的結論。事實上，對托爾斯泰主義的全部接受，那會使 L·柴門霍甫為共同語而作的整個鬥爭成為毫無必要和毫無用處。L·柴門霍甫就停留在這樣一個城市小

資產階級的中間地位，既不願復返於產業革命以前的手工業時代，但同時又呻吟在現代化、集中化和國家化的金融資本之重壓與剝削下面。

這樣的中間地位，所能生出的不過是一種無定型的等待與希望，就是『總會有個時候一切都發生變化而逐漸好轉的。』

可是在L·柴門霍甫那無定型的觀念主義者的熱望中，是和托爾斯泰主義，具有某種共通物的。這可以由托爾斯泰自己1894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信中證明。他這樣寫着：

『我常常見到人們相互仇視的關係多由於情意互通上之物質障礙而起。世界語的學習及其推廣、無疑的是基督徒的事業，幫助人在地上創造出天國來的事業，這就是人生主要而且唯一的目標了。』

托爾斯泰著作的出版社『Posredniko』，由於這些話，而開始對於世界語發生興趣，同時決定為世界語發動一個更廣大的宣傳。

可是對於沙皇政府就是托爾斯泰所給予現代的消極批評，也感覺着不快。

它注意到了托爾斯泰主義和世界語主義在將來所可能發生的連繫。所以在1895年的第二期『世界語者』上發表了一篇托爾斯泰的『信仰與明辨』以後，這就很夠作為一個理由來永遠禁止這個雜誌向俄國輸入了。

更密切地連繫這兩個運動的企圖，就這樣給予了尚在幼弱無力的世界語以一個重大的打擊。

這或許就是另外的一個原因，為什麼它們的結合沒能

變為更加密切而堅強。

(註二〇)：參閱博耶“柴門霍甫傳” P.20——譯者

(註二一)：El la verko “Kredu via mem” en esp.: L.N. Tolstoj
“Pri la perforto, milito kaj revolucio” Sofio, 1923,
P. 12

柴門霍甫觀念論的矛盾

L·柴門霍甫這個誠懇的人，常常注視到現代社會中的各種缺陷；但是在給予這些缺陷以消極的批評時，他不能作出具體的積極的建議以消除它們。

他願意而且企圖着給予他的一切思想和言論以一種社會的價值。在日內瓦第二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時（1906年），他說：

『模稜兩可的官話，對於我也許是極大的罪過。因為我到你們這來是從一個國家，那裏有幾百萬人正在為着自由，為着最起碼的人類自由和權利而艱苦地鬥爭着。』

但是被局限了的世界語主義的概念，僅能允許他談到各種後果中之一，而完全不能觸及它的原因。

『除了純政治性的鬥爭，那是我們世界語者所不能給及的，在那個國土內，我看到了種族與種族間的鬥爭。』柴門霍甫很清楚地講到：

『一羣可憎的犯罪者，他們用各種最狡猾，最卑鄙的方法，用集體傳播着的謊語與誣蔑，很巧妙地地一些種族

與其他種族間，創造出可怖的仇恨來。」

但是他找不出必要的字句來說明這個動機，就是為什麼那些誣語與誣蔑會被傳播着。

他說：『我們不相信中立基礎會從人裏造出安琪兒來』。……可是他在結尾的時候，仍然這樣表示和希望着，就是這個基礎『至少會消滅那些獸行與罪惡的大部。』

然而就是這個僅僅排斥現代罪惡的希望，對於那些具有其他不大富於理想主義的觀念和概念而走向世界語的人們，也覺得不愉快而不能接受。他們是和為着同樣概念而迫害着托爾斯泰主義的沙皇政府，在思想方面團結起來的。

那些人們——特別像波佛朗侯爵(markizo de Beaufrnt)——那樣的偽善者與反進步者，在當時就曾堅決地主張：以1905年布倫大會所通過的『世界語主義宣言』為根據，而完全禁止『任何世界語者把其他的希望與幻想連繫到世界語主義上。』

L·柴門霍甫他願意心口如一——他不能接受這樣的要求。他在第二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上宣稱着：『倘如有人要強迫我們世界語的初期戰士，在我們的行動中，避免了理想上的一切，那麼，我們就要憤激地把我們為世界語而寫出的一切都撕碎了，焚燬了，……並且我們將高呼：『同這樣的世界語，專供作商業上和實利上目的之用的世界語，我們不願再發生什麼關係。』

同樣的話，他在劍橋的第三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1907)演說的結尾中，也複述着。

『世界語萬歲！但是我們更不要忘記：世界語內在理

想萬歲！人類將愛萬歲！一切一切能打破種族間壁壘的東西萬歲。」

柴門霍甫的一生是為他自己虛幻的理想和現實生活的巨大矛盾而苦惱着。

他意識到了他的建議的不夠；但是他不知道怎樣把它們擴大與強化。

在世界大戰中，他為將來召集的萬國中立宗教大會所起草的通告中，已經計劃着建立一種中立人的倫理的規律。(註二)

在這個規律裏面，他可能更廣泛地和更清晰地展開了他的社會的政治的理想。

可是死神的降臨和歐戰的延續，阻礙了柴門霍甫這一個最後計劃的實現。

(註二)：參閱楊譯“柴門霍甫傳”，P. 172.——譯者

柴門霍甫的人格

柴門霍甫溶合了兩種理想在他的精神中。就是(一)合理的國際語和(二)解決種族間相互衝突問題的某種政治的與哲學的理論體系。

在他的第一個理想上，他獲得了光輝的成就。而在第二個上，他是失敗了。可是他的犧牲精神和為着他的理想而貢獻他最寶貴的一切的準備和他自身的人格，是沒有懷疑的餘地的。

他沒有任何個人的虛榮心。他自願於各種場合內把自己隱避起來，當這種隱避是有利於他的理想的時候，甚至於只要這種隱避是可能的時候。

1900年提出於法蘭西科學促進會的報告，是他的著作。可是一直到了1910年以前，對於這個在當時為關於世界共同語之文獻中的巨著，他始終沒有宣佈是出於他的手筆。

直到1910年華盛頓萬國世界語者大會上，他才承認了這個報告是他的著作。

新語言是迅速地發展了，而在這個語言的正式創造者的地位，困擾了他而且妨礙了他自由談論和提倡一些更為高貴的夢想，和雖然錯誤而滿含善意的社會改造的理想時，他這種自晦的傾向，就更加日益顯著了。

在巴塞羅納（Barcelona）第五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1909年）中，他曾說：

『世界上常常把我看作世界語者羣的當然代表，……我極端希望着他開這一個過於使我苦惱的角色。』

世界語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時候，在克拉科（Krakow）第八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上，柴門霍甫終於宣布：

『請允許我最終放下我所演的角色。這次大會，就是你們看見我站在你們『前面』的最後一次了。此後，假如我還能來，則你們會看見我總是在你們的中間。』

他以以下的理由，來辯護他的引退。就是有許多人們，因為不贊同他個人或他的政治與哲學的主張，同時也反對了世界語。

柴門霍甫希望着從運動的正式代表的角色中解放出

來，他以後可以更熱烈地為着他的理想而工作、談論，和毫無顧慮地尋求對於現有社會病態可能的救治方法。

可是他失敗了。

在第十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巴黎）開始以前，爆發了世界大戰。柴門霍甫甚至沒能和他有同一思想的友人們討論1913年公佈的『人類一員主義宣言』。

柴門霍甫的最後悲劇

在柏里華所著的『柴門霍甫傳』裏，曾講到柴門霍甫曾經夢想着在大戰結束以後，就馬上召集一個『萬國中立人類宗教大會。』

可是大戰繼續着，而且似乎沒有結束的徵象。在為這個大會所準備的開會通知草稿上，柴門霍甫接連地寫着：

『大會定於1916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舉行於瑞士，』以後又改為『1917年八月一日。』最後則用那戰慄着的手寫出『在大戰終結以後。』

世界大戰的原因，始終沒有為柴門霍甫所了解。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所能想到的，僅只是關於語言與宗教的中立，可是從沒有深入到那本質的因素即現代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因素上。柴門霍甫已經預想到這個戰爭的結果，是會毫無所獲的。它不過把戰前的國境，作一度的割裂與組合而已。

在1915年復活節所發表的『致外交當局書』，就成為他的白鳥之歌了。（註二三）

他沒有注意於民眾，而轉向於他們的名義代表們——外交當局。

柴門霍甫堅定而清湛的精神，在新語文的創造上，曾經那樣地重視集體主義的功能。而在社會問題的解決上，却不再相信人民大眾的創造力了。當他捨棄了那集體主義的觀念以後，遂陷入於極端無望的情勢中。

在柴門霍甫的建議中缺乏堅定性。而關於實現他的建議的可能性，他自己也缺乏自信。

對於現代社會罪惡的根除，他沒能想到某種明確的方法而僅只作了幾個溫情的提示。

在『致外交當局書』中，僅含有一個唯一的要求，就是在戰後要宣布：『每一國土，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要完全屬於當地的居民。』他堅信着，假如能把那些國家的名稱，完全易以地理的名稱（例如彼得堡國，柏林國，巴黎國）那已經可以為這個大戰的重要收獲了。

然而就是這樣純潔的建議，對於那些在戰後和會上的外交當局們，也沒有接受的可能。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柴門霍甫在1917年四月十四日死去了。可是他那些觀念主義者的幻想與希望，却早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那發動第一次大戰的炮聲中，顯出是自生便死的了。

（註二三）：白鳥喻詩文諧美之詩人或作家。白鳥之歌則喻詩人或作家死前的絕作。因傳說白鳥終身不歌，除了臨死時歌唱一次，歌聲美妙異常云。

——上篇終——

II

國際語創始者與
理論家的柴門霍甫

柴門霍甫童年的世界語理想

天才兒童與天才青年的柴門霍甫，在他的故鄉比亞里斯托克和他的祖國波蘭內，是曾經強烈地為那些種族間的鬥爭所感動。從他的精通多種語文的父親所繼承的語文才能把他的熱情引入於世界共同語的理想。在他看來，這種共同語許會緩和那些種族間的仇恨的。為着實際地解決這一問題，他便堅執而持續地工作着。他，一個不曾特殊地研究過語言學和語文科學、謙遜而實際執行業務的醫生，藉着這個堅執性，使世界語文的問題得以解決。並且解決得那樣澈底，是在這個分野的工作者，從沒有一個作到那種程度的。

柴門霍甫在他致波羅夫克(N. Borovko)的信中、曾經論及世界語的由來說：『這個理想，我為着它的實現而供獻了我的一生，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發生了，並且從那時起，它從來沒有離開過我。我和它一塊生活着，甚至就難以想像一個沒有這個理想的我。(註一)』

由於這個理想而起於柴門霍甫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壓力，可以表現在『我的思想』這首小詩內，它還是寫成

於柴門霍甫國際語方案(註二)公布以後的。

『吾心』	『創痛』，	老『』	『災魔』
靜言趨赴汝，		所獻已幾何！	
『責任』如祭壇，		奉之犧牲多，	
『青春』予最寶，		一擲淚滂沱。	

在與波羅夫克的信中，柴門霍甫敘述了他的世界公語的理想是怎樣慢慢地進化的。

柴門霍甫在他的童年，就夢想着採用一種國際語文。

可是他不久就領悟到，在那個時候『我們或許只有為高等社會層所使用的國際語。』(註三)

他開始意味到：將來的國際語在某種程度上的階級性。同時他建立了一個原則——『對於未受教育的人們容易學習。』(註四)

起初，他想着創造一些簡短的音綴，如：ab, aba, aca, ada……等，而賦予它們以新語言單字的功能。這種同樣的理想，在一世紀以前，一個世界公共語理想的先驅者 J. P. de Ria(註五)已經表現過了。

『Švejcarskaja』和『perkimaferskaja』這兩個俄國字使柴門霍甫領悟到接頭接尾的功能，可使文字簡化。它們可以使這語文的基礎字彙大大地縮減下去。

柴門霍甫思想的演進，包括了二百五十年來在世界共同語領域內人類思想的整個進化與全部理想。

(註一)：“Lingvo Internacia” Uppala, 1896, N. N. 6-7.

(註二)：即世界語第一書——譯片

(註三)：P. K. P 299.

(註四)：F. K. P, S93

(註五)：J. P. de Riv de Baulmes en Suiss “palais de soixante
quatre teustres eclairent au Dictionaire universel” Pe-
terburg, 1788

兩個原則 合理文法與國際化字彙

柴門霍甫成功的原因，是因為他是第一個能把他的語文體系建築在那些國際語存在的必須要求與前提上的人。而在他以前特國際語先驅者，則僅只解決了這些必須前提中的一個或兩個。

法國哲學家 Descartes，一個最早的國際語理想的先驅者，已經考慮到這些前提中之第一前提了。

在1629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寫給 Mersenne 常正的信中說：

『這種語文，應該只有一種動詞變化法，名形詞變化法和造字法，它完全不要那些由於習慣而殘害語言的不規則形式。這語文的變化法，是藉着加於那些基本字根上的接頭與接尾的幫助。這些接頭與接尾可以在普通字典中找得到。那些沒有受過很好教育的人們，經過六個月的期間，藉着字典的幫助，就可以開始使用像這樣的一種語文。』(註六)

這個文法簡易的要求，是被 Descartes 以後所有的人造語的計劃者所接受了。它也同樣確定了世界語文法的

構造。

那第二個要求直到 1855 年才為法國的一個哲學家 Charles Renouvier 所具體提出。他曾確說過：『世界共同語在它的計劃必需是哲學的，而在它的字彙上必須是經驗的。這就是說，它的計劃必須建築在邏輯的思想分析上，而它的字彙必須從一些活的語言中來挹取。』（註六）

可是共同語的語素必須國際化的這種理想却沒為一般所接受。有些以 Renouvier 所提示的原則為基礎的國際語方案，完全無人注意，無人支持。

事實上，只有柴門霍甫在一八八七年公布了國際語方案讀本是第一個更廣泛闡揚了而且真正實施了國際化原則的。

（註六）：R. Descartes "Oeuvres completes" Paris, 1897, édition Cerf. t I. p. 76.

（註七）：Ch. Renouvier. "La revue philosophique et religieuse., Paris, t, II, p, 55-85 (Aout 1855)

柴門霍甫堅毅的努力與試驗

在柴門霍甫第一書的序言中，就表明了牠對於這個要求之清晰的了解，並給與了先前的那些國際語方案以一種適當的分析。

『所有的這些試驗，或是提出了些必要的基本表現符號，或促進了文法的簡易化，和以其他臆造的單字去代替自然的單字。……某些語文的試驗是屬於第二範疇的，可

是它們毫無「國際性」』(註八) 同處他寫着：想着使這樣的試驗成功，它現在缺乏，而且將來也會永遠缺乏在那些思想方式不同的人們間，獲取『同意的可能』。

在1878年，這個語言就似乎完成了。這年的十二月五日，最後一年級中學生的柴門霍甫，和他幾個同志的同學，慶祝這個新語言的產生。而在開始大學修業的時候，他必須把他的方案交給他父親，為他保存到完成大學的研究以後。

他父親不了解他兒子的理想，並且也不同意於那些理想而把那些著作燒掉了。(註九)

在1881年柴門霍甫知道了這個事件的時候，他勇敢地重新開始工作來準備世界語的新課本。從1881年直到1887年，柴門霍甫繼續着改變和修正這個語言，使它適合於他以翻譯與寫作對世界語所作的一些試驗。

柴門霍甫在給波羅夫克的信中寫着：『雖然在1878年，這個語言在我看來就似乎已經全部完成了，六年來我仍然努力着使這個語言達於完美化。』

這種堅執性，幫助了柴門霍甫的著作，走向更大的進步。像 Volapuk 的創始者 Schleyer 那樣對於語言創造工作的草率性，是不存在的。事實上 Schleyer 草成他的語言方案，僅用了一個不眠的夜，全部完成也只經過了幾個月的時間。(註一〇)

在世界共同語領域內，只有兩個工作者，顯示出和柴門霍甫具有同樣的堅毅。即1817年至1862 Solresol 的創造者 J. Sudre (註一一) 1852年至1886年的四大巨冊萬國語

全程的完成者 C. Letellier。(註一二)

但是這個理想的先驅者們，知道而且能夠實現了的，僅只是第一要求，即關於文法的簡易性。

柴門霍甫在給波羅夫克的信中說：『他對他的語言，作過這樣長時間的試驗以後，終於發現了並且感覺到這個語言的精神了。』自然，他不是說的某種精神，而是說發現了對於這個語言最適宜最簡便最容易了解之形式的某種程度的慣用。

由於這個結果，他在提出於法蘭西科學促進會（1900年）的報告中，可以很驕傲地宣稱：一切他都考慮過了。他對於國際語的形式以及推行的方法是很有確信的。

『是的，我們可以預想到，怎樣的語言，才是國際的，這我們可以確切而肯定地預想到沒有絲毫懷疑。』（註一三）

亨利·菲力浦（Henry Phillips）慎重地研討了採用國際語各前提之理論以後，在他所提出於美洲哲學會的報告中，完全正確地證實了：『它（指柴門霍甫國際語方案）所賴以遠立那些原則，是全然正確的。（註一四）

(註八)：Dro. Esperanto, "Mejdunarodaj jaziko — Unua libro" (por rusoj), Warszawa, 1837, p.p. 5-6 (La Zamenhofa traduko de la sama frazo en "F. K." estas pli arkajka k' enhavas pluajn rusismojn)

(註九)：E. Privat "vivo de Zamenhof" London, 1920, p.p.53,65.

(註一〇)：R. Kniele, "Des erste Jahrzehnt des Weltsprache Volapuk," Ueberlinger. B. 1839, p.4.

(註一一)：J. Sucre "Langue musicale universelle" Paris, 1866

(註一二)：C. L. A. Leteffier. "Cours Complet de langue universelle," Caen, 1952-55. 4 vol.

(註一三)：“Aldono al la dua libro de la lingvo Internacia” Varsovio, 1938, p.3.

(註一四)：F. K. P. 286.

世界語的黏合性

同時關於語言之簡易性和立即可用性的問題（『不管世界上是否接受它』），柴門霍甫能很實際地解決了。

除了文法的簡易以外，柴門霍甫還另外引入了一種新的東西。在第一書裏他寫道：『我使用了把各個獨立單字所表現的基本概念全部分解的方法。整個語言不是構成於各個單字文法上變換的形式，而是構成於一些不可變換的單字。』（註一五）

藉着這個語言原素的分解法，柴門霍甫給予了這個新語言以一種黏合語的特質。可是他在任何地方，從來沒使用過這一個名詞，同時，因為他不是語言學家，或者甚至不能適當地意味到韃靼土耳其語的黏合特質。

世界語的這個特質，簡易化了它的學習與使用。很久以後才為 N. J. Marr 所確認了，他是語言學會會員之一，也是所謂耶弗語言理論（註一六）的作者。

在這一點上，柴門霍甫深湛的語言思想，獨立地實現了曾在兩世紀以前所表示過的理想。

Bernard Lamy——Descartes 後繼者之一，說過：著名

的遊歷攷察家 Jaque Thavenot 當他通曉了鞞語構造之爲人簡易的時候，他提議爲着簡易化現存各自然語的學習，應依照鞞語的方式（即黏合語）來修正它們的文法。

柴門霍甫怎樣一貫地遵守了那個由他自己所發現的黏合原則，在 E. Boirac 教授的敘述中指明了。他說：柴門霍甫把『dzino』（妻）這個字（從 kronprincdzino 這個相當於德文『kronprinzessin』的合成字取來的）分解爲兩個獨立的單字『dzo』（丈夫）和『ino』（女性）。（註一七）

(註一五)：Z-an iom arkaikan tradukon de tiu frazo, vidu P. K. P, 243.

(註一六)：蘇聯言語學家馬寧 (Marr) 所發明的言語理論，以新科學的新點研究語言的起源與進化。在史前言語學的研究上，他發現語言進化的原則是由分歧而統一的，而且證明了每一種語言都是人工的，徐洙編譯之「新與言語理論」及斯皮義多維基之「言語學與國際語」中均有介紹——譯者

(註一七)：Oficiala gazeto "Esp-isto ... Paris, Decembro. 1913. p. 144.

作為語言學家的柴門霍甫

值得注意的是：柴門霍甫以可驚的明澈與深湛滲入於國際語問題的精髓，而在一般的語言科學上，則顯然始終不怎樣高明。他在這方面的智識與概念，並沒有高出於斯可拉學派的印度歐羅巴語言學的一般水準之上。

例如：他以為國際補助的接受，可能妨害現代語言以

國際化的形式來鞏固自己的進步傾向。

在第一書裏（p. 4）他寫着：因為研究外來語文的結果，『語文在獨立進化上就被攪亂了，它們從外來語裏借取一些必需的表現方法與字彙。

這種同樣的論證，他在1900年提出於法蘭西科學促進會的報告中重複着。

在這個報告裏，關於那些認為語文和語言是依賴於氣候、遺傳和民族及歷史條件的交織等等的假說，柴門霍甫稱之為『毫無意義的學者的空談，沒有內容的偽科學的瞎扯。』

他沒能使自己更進一步的了解：語言是需要和經濟條件的必然產物。所以他以為它會有獨立自主的功能，而常常喜歡過度誇張了語言的任務。

在分析過去與瞻望未來上，柴門霍甫僅僅重複着那些聖經傳說中關於巴比倫之塔和斯可拉學派的一些老生常談。柴門霍甫在一九〇五年布倫大會的講演中說：『人類的家族，在遠遠的古代就分散了，而它的成員們遂中斷了相互的了解。』

那密切地連繫着語言進化和人類物質文明整個歷史，而確證了柴門霍甫自己所建立的國際語的實際要求——前提為正確的現代語言理論的觀念，對於他却始終是生疏的。

在他還殘留着有點個人主義和個人的理想主義。因為他堅定地相信：『創造一種在各方面完備的，適宜的而且有生活力的語言，是需要一種特殊的才能和靈感的。』

(註一八)：P. K. P. 305.

語言創造的集體主義

不管柴門霍甫那些個人主義的概念如何，而他的精神却為那接受了他的理想的羣衆的集體創造力，找到了一個恰當的位置。

在他的第二書附錄裏 (p. 6, 7.) 已經有那樣深思的表現。

『我沒有意思來編著一部完備的字典，和依照我個人的好惡來創造一個從頭到腳的完整語言。……』

『一個人在這種地方，僅能是創始人，而不能為創造者。一個全世界共用的語言，應當是以整個文明世界的合力勞績一步一步地完成的。……』

『……我的第一書 (國際語，序言及讀本) 應為國際語的共同基礎。……至於其他的一切，則應由人類社會生活來創造，和我們在每一個活的語言中所看到的一樣。』

在同書第九頁中，他以自然語的歷史經驗，論證地贊美這個主張：

『許多人疑慮着，由於國際語廣泛的自由，它不久會分裂成許多不同的語言，可是知道一點語言歷史的人們不一定能了解這個疑慮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我們大家，是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之上來工作。……這個基礎對於國際語，就

和每一種語言在形成書寫文學之初，它的語言原料對每一語言自身有一樣的意義。……新創單字，按照着日益發展的需要，一個跟一個地創造出來了。雖然它們是為不同的人們在不同地區所創造，沒有指導者，也沒有立法者，而這個語言不僅沒有分裂，相反地它更日趨統一了。在這種逐漸強大的公共的文學語言之前，方言與土語慢慢地消滅了。』……

由於對這個指導理想的堅定的接受，使柴門霍甫能夠在同處清晰而恰當地預言出國際語將來所遵循的道路——一個有統一性，可為一般所接受的，由各種形式中所選出的道路：

『因為國際語，依賴於人類的意向，更甚於其他一切條件，——形式統一的過程，在這個條件之下，會更快地進展着。

『那些難以令人滿意而造成的字，不久就消滅了，而那些可以滿意地造出的字則會存在着，並且滲入到語言裏去。至於那些同樣滿意地被造出而有不同聲音的字，在某種時期內，它們以同義語的方式，相互競爭着。但經過不久的時間，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形式中之一是比其他一切的形式更多地被使用着。不久這一種形式，就會把其他一切形式排斥了。』

這個關於國際語的發展建築於集體使用基礎之上，而不依賴於任何個人的理論，在柴門霍甫之前，從來還沒有人表現過。這一觀念的創作權是完全屬於柴門霍甫的。和我們所僅能看到與了解的一樣，正是這一原則，預定了國

際語事業的發達與進步。

柴門霍甫認為自由發展力的不足，就是 Volapük 失敗的主因。

柴門霍甫在 Antwerpen 第七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1911年）的講演中說：

『Volapük 失敗了，主要的是由於他包含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自然發展力的完全缺乏，每一個新字的形式，必需永遠地取決於一人或一個容易引起糾紛的小集團。』

『假若它沒有這個不幸的為人們所不能修正的錯誤，Volapük 也許永遠不會死亡，我們每一個人，也許都用 Volapük 講話了。』

柴門霍甫關於世界語發展之路的理論，在布倫第一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上，是被正式地接受了。大會宣言的第四要點是：『世界語沒有個人立法者，同時也不依賴於任何個人。世界語創造者的意見與著作，和其他任何世界語者的意見與著作一樣，僅有私人的性質，對任何人都沒有強迫性。每個世界語者所必須遵守的世界語的基礎，就是「世界語基礎」這一小書。任何人沒有權利來變易它。』

『一切不能用「世界語基礎」裏面所有的材料適當表現的觀念，每個世界語者，可以用他所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表現，和在其他各種語言裏所作的一樣。』

在 1908 年 Dresden 世界語者大會上，柴門霍甫已經有可能不僅預言這些原則的後果，而陳述它的現實成績了。

『我們的語言，是不斷地更加豐富，更加有伸縮性

了。逐漸不斷地出現了些新的單字與形式。有些是日益堅強了。另外的一些則不再為人們所使用。……在各個不同的國土內，沒有任何地方，顯示出我們語言的差異，雖然各個作者所居的地區有着遼遠的距離，而他們的經驗愈加豐富，則對於吾語的使用便愈加相互一致。

柴門霍甫與世界語改造

可是柴門霍甫對於他所創立的世界語基礎，除了以集體使用為基礎的發展之外，是不是還需要某種的改造，看來是相當慎重的。

所以在『第一書』裏（p. 29.），他答應注意地登記起所有的批評來，並在經過研究以後，給這個語言以必要的修正。

他已經預想到這些偶然批評，也許不能使每一人都滿意。

『如果對某些人們，這些修正覺得似乎不夠——那麼，他們不要忘記：這個語言並不是以後就不准作更進一步的補充了。不過導入這個修正的權力不是屬於我，而是屬於為一般所承認、有權威的語言研究院……』

『它在必要的場合，可以逐漸地在不知不覺中，導入一切必要的修正。』

事實上，柴門霍甫在1888年引入於語言基礎的唯一合理的修正是包括着一些以 *kiam tiam*……等，替代 *kian*，

tian……的一些形式。(註一九)

以後在 1894 年，柴門霍甫為着滿足一些他的信徒們的願望，在世界語雜誌上，登出一些『關於世界語改造』的專文。(註二〇)

因為這種改造必須適合那日益增多而散處於各國的世界語者之興味與要求，1894 年，在『世界語者 (Esperantisto)』第三期上，柴門霍甫提出了一個主要原則，作為那些可能發生的改造之基礎。

『……比一切都重要，我們的語言，應當對於每一個民族都是最簡易的。同時只要可能，它自身應當不含有任何和其他民族習慣相衝突，或者使他們感到陌生的那些東西。

『……在我們純粹實踐的事情裏，那些不適合的理論邏輯，必需向那更適合的人民的實踐習慣來讓步……。

『……我們為着不無謂地，使吾語鬥爭更加困難，我們必需避免違反各國人民習慣一些無意義的鬥爭。』

那些提出的改造方案，沒有得到參加投票世界語者之大多數的贊助。這個投票的結果，宣布在 1894 年 Esp-isto 第十六期上了，反對改造的 157 名，贊成的 107 名。

世界語於是就照舊沒有改變。

可是在這次投票以後，柴門霍甫還是非常正確地以為這二百六十四個世界語者，並不能預先決定國際補助語更進一步的命運。

在宣布這個投票結果以後，他緊接着寫着：

『有些人或許以為這個既成的決定，將永遠禁止吾語

之任何改動，而且使它永遠完全僵化。那是錯誤的，因為每個人必須很清楚地了解：對於一個依我們的希望，在不久以後會有更多更多其他人們來參加的事業，我們這很少數的人，不能作任何永久性的決定。這次大多數因為各種原因，認為在現在沒有任何必須改動地的方，至於以後人們是否會作某種改動——關於這，沒有人作什麼決定，也沒有人能夠於目下決定。

(註一九)：“Aldono al Dua libro de la Lingvo Internacia” p. 5-6

(註二〇)：“Esperantisto”，Nürnberg, 1894, Nro. 1-11

語言形式創造者及 文體家的柴門霍甫

柴門霍甫，對於吾語之難以預料的改正，所作的這個保留，是完全正確的。

柴門霍甫個人在語言實踐中的經驗，就已經表明了：雖然以精深的思想創造了吾語基礎的他，仍然和其他世界語者一樣，並不能常常馬上發現那些最恰當的語言形式來應用。

他曾誤用過 *tian, kian*……等形式，以代現在的 *tiam, kiam*……等。

在『第一書』裏，我們發現有“*dek millionoj homoj*”(以代 *dek millionoj da homoj*) 的形式。

就是在『第二書』及『第二卷附錄』裏，我們還可以

找到一些表現法，它們可能使世語師資講習班裏學生們遭遇到失敗。

“mian laboron mi prezentas je l'tempo de unu jaro (以代 ~~mi~~ je l'daŭro 或 dum unu jaro, por unu jaro,) (註二一)

“La publiko povu konigi tiun ĉi lingvon ĉiuflanke”

“Kio li parolas pri aferoj tute sensignifaj kaj pri l' aferoj efektive gravaj li ne parolas eĉ unu vorton” (以代 “kial li”)

“.....artikuloj ”

“.....mi subskribita..... (以代 “mi subskribinta”)

“.....aldonita..... (以代 “singona”)

“.....fonda provado” (以代 — fundamenta, detala esploro.)

“.....havas tian signifon, kiun havis.....”

“.....estus dezirata.....” (以代 “estus dezirinda”)

“Danke la unu gramatikon”.....

類似的形式與語法，發現在世界語初期柴門霍甫每一著述與寫作裏。甚至在『基礎文選』(Fundamenta Krestratio)裏，也可以找到。

這些形式大部之被使用，可能的解釋是由於民族語(主要是波蘭與俄國的)形式與語氣之不自覺的世譯。

柴門霍甫很正確地勸告過：

『我們必需避免那些民族的慣用語，同時我們必須努力以最邏輯最國際化的體裁來翻譯它們的意義。(註二二)』

但是這種國際化現象，只有從具體使用及語言經驗相互交換的結果中才能出現。柴門霍甫甚至不得不為自己來辯護：

「有些世界語者，以為我在我的寫作裏是用的斯拉夫文體，這個意見是完全錯誤的。」(註二)

他這種說法，至少對於他初期的寫作及論文是不對的。

可是，經過兩三年世界語實際實用以後，柴門霍甫的文體很顯然地進步了。

1888年至1890年間，比1881、1887年間世語文體與字形有了更多的進步。因為這時已經不是個人而是許多散在各國的同語言的信徒們參加了對於這種或那種語言形式的研討與接受。

(註二一)：注意!“daŭro——” “dum” 各字，在第一書裏是已經使用過的。

(註二二)：“La Revuo,” Paris, 1907, oktobro.

(註二三)：“La Revuo,” Paris, 1906, decembro.

科學界及政府當局對於 接受世界語之可能的任務

柴門霍甫知道他一個眼科醫生的個人威望，無論如何不能引起科學界及政府當局的敬仰的。

所以，也是為了純粹策略的關係，他幹得很聰明，而

宣稱他以為自己不過是這個語言的創造者，而完全不是它的唯一創造者。

他屢次向一些科學團體來申述他的理想與語言體系，同時在他們面前表示相當的敬意。

在1908年 Dresden 第四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他的講演中，柴門霍甫說：

『在二十年以前，美洲哲學會想着自己從事於國際語事務的時候，這對於世界語的作者，是那樣高不可及的權威，因此他就即刻決定把一切轉交到這個會裏。……』

1900年他提出於法蘭西科學促進會的報告中，柴門霍甫很精詳地分析了下列各問題：(1)國際語是否需要，(2)它是否可能，和(3)人們能否實際地應用它。對這些問題，他都給予了清晰而適當的解答。

可是對於第四個問題——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這個語言才會被採用，——柴門霍甫的答覆却猶疑了，他以為最後，為着解決這個問題（假如它不能由社會團體自己來解決的話），各個政府或許會參加的。（註二四）

他說：『單獨的個人或社團，在這個地方是什麼也不能作的。他們所能的僅僅是繼續不斷地來鼓弄政府；但是離開政府的參加而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是無能為力的。（註二五）

他一面堅持着國際語會和其他民族語一樣進化的理論，可是還對政府的協商保留導入一切必要的改造和變易到這個語言裏邊的權利來的可能。（註二六）

柴門霍甫感覺着他似乎受着拘束了。而且似乎想着在

某種社會常證明他敢於作一個人造語方案創造者的勇氣為正確。他斷言着：他作這事，僅僅『因為一切抽象的理論鬥爭，一般地是歸於毫無結果的。』（註二七）

此後，當世界語界變為更加擴大而有力，同時它對於柴門霍甫個人，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獨立性的時候，他想出另外的詞句來，以確定那可能出現的有權威的國際語委員會的適當任務。

1908年，在Dresden大會上當談及美洲哲學會的參與和它把世界語事件置於它的指導之下的企圖時，柴門霍甫說：

『很幸運地，美洲哲學會的企圖沒有成功。我所以用「幸運」這個字，因為事實上，現在，當我更加有經驗的時候，在我看來，毫無疑義地這些理論家的企圖，假如能夠繼續一個更長的時期，那麼，國際語的整個理想，早已不為人們所相信，而且永遠地——至少是很長很長的時間，被送進墳墓了。』

最後一次在華盛頓第六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上（1910年），關於各國政府對於解決這個問題可能的任務柴門霍甫說：

『我們所努力的這個目標，有兩條路可以到達：或以私人的——即人民大眾的努力；或以政府的法令。我們的事業，最可能，是由第一條路來達到。因為像我們這樣的事情，一般地只有在一切都已準備完成的時候，政府才出來予以承認或幫助的。』

即使政府能創立某種特別委員會，則這個組織——依

察柴門霍甫的意見——亦僅能以以下的方式來推論。

『我們不要完全不必要，無目的地作些新的冒險試驗，而簡單地接受那現存的東西吧！我們給它以政府的有權威的支持吧！……』

柴門霍甫常常這樣反覆證明他這樣的意見為合理：

『……假若這個委員會是謹嚴地處理它的工作，那麼，它不會冒險把整個新語言的創造工作，放在它自己的身上，也不會採取其他尚未經生活充分試驗的語言計劃。』

(註二四)：“F. K.” p. 274.

(註二五)：“F. K.” p. 285.

(註二六)：“F. K.” p. 313-14

(註二七)：“F. K.” p. 284.

柴門霍甫關於促進世界共同語事業的理想

柴門霍甫對於他努力來發動創造一個具有實在機能的國際語的困難是十分了解的。以他一個青年眼科醫生的聲價，真使這整個計劃太冒險了。可是他確信：他一切都已預料到了，並且盡可能地也一切都已準備好了。這使他在『第一書』裏可以這樣寫：

『幾種幸運的由深思而得的理想，鼓勵着而且鞭策着我來嘗試；我是不是能為着合理的萬國語的創造與採用而

次第掃除了一切障礙。』

他以為他的主要的實際的工作就是消滅世人漠然無關的態度。他為着達到這點，而徵集人們答應在有一千萬人願意學習這個語言的時候，他個人便開始學習。

可是在這個試驗上，柴門霍甫失敗了。

在一年以後，柴門霍甫事實上已經放棄了徵集同意答應達到那個數目的希望，而把他的主要注意轉向於這個語言的立即實際使用。他寫道：『不管投票的進行怎樣，這語言的書籍是要出版了，而這個事業的自身也自會前進的。(註二八)

他自己對於這樣直接實施的行動與宣傳，顯示出一個模範。柴門霍甫的語言方案是第一個同時以四種語言(俄、波、德、法)出版，而在三年以後，又增加了九種語言(英、希伯來、瑞典、西班牙、拉特維亞、羅馬尼亞、丹麥、保加利亞、意大利)的。

(註二八)：“Dua Hbro d: P L, I., Varsovia, 1883, P. 14.

語言的實際應用及 世界語者的增多

由於這樣的活動——柴門霍甫遂能實際地加速這個語言的日益擴展而普遍的應用。他很清楚了解這點的重要性。正由於這才加倍證明了前章所引用的他批評美洲哲學

會的企圖為『理論家』及企圖，這些話的正確性。他明白這個語言的成功，應特別歸功於那些參加了這個語言之最初使用與豐富化工作的伴侶們。

④就這方面說，所謂世界語的內在理想，對於這個語言，是作了很大的貢獻。它組織了些有同一理想的人們，環繞在柴門霍甫的周圍。他和這些人們不僅有共同的語言，而且有同一的熱望。那些初期世界語的文藝作品和關於民族間之和平與友愛的熱情的詩章，幫助着護衛了那初期世界語者的共同理想與共同語言得免於崩壞。至於那些崇尚現實而不為那曇花一現的內在理想所感動的人們之走向世界語那是更後的事了。他們開始使用這個語言，開始以它作為相互鬥爭的工具。可是這時的世界語，已經達到這樣堅強的階段，即世界語者內部的爭論已不能再威脅這個語言的統一性和它進一步的發展力了。

當然了，那比世界語早七年出現的 Volapuk，也是以這同一理想來推動的。

我們只要一讀 Volapuk 者的讚美歌，對這就很可以明瞭了。

「我們要懷着熱情，
來努力加強友誼；
要試着實現幻夢，
號召吧，和語言作者一齊：
大地上整個人間，
一個世界一個語言。」(註二九)

可是 Volapuk 的作者——J. Schleyer 沒能實現了語

文因素國際性的前提。柴門霍甫在『國際語的本質及其將來』一文中寫道：『Volapuk 解決了的僅只是文法上的問題，而關於字彙便棄置於完全不顧，僅僅堆積了各種臆造的單字。（註三〇）

過了些年，柴門霍甫想出了其他的語句，以讚揚 J. Schleyer 的工作。他原則地承認，Volapuk 即使沒有建基於語言因素國際化的基礎之上，可是究竟為自由發展與集體創造所決定着，也可能進步而且獲得那必需的形式。在 Antwerpeno 大會（1911年）講演中，柴門霍甫說：

『在 Schleyer 以前，關於國際語，人們也曾夢想着，並且為它而努力過，可是這些僅僅是理論的草案，幻想之園的一些蒼白的沒有軀殼的幽靈。他是第一個人向自己說：為着國際語，我不願幻想而願工作；當一切在週圍沉眠的時候，他是第一個人，實際創造出國際語的運動。

『Volapuk 不是被 Esperanto 所征服的，它是因為缺乏發展力而自行漸滅的，在那個時候，世語界要來征服什麼，還是過於無力呢。』

這些話為國際語形成了重要而實用的前提，而能實現這個前提的，只有 Schleyer 和柴門霍甫。

（註二九）：參閱 *Al Eterna Lumo, Vitebsk, 1921, Nro 3-4, P. 10.*

（註三〇）：“F. K.” p. 31.

世界語者的語言統一性

1908年，柴門霍甫在他的大會(Dresden)講演中說：

『在初期的時候，許多世界語者看到我們的事業發展得異常遲滯而困難，便以為這個原因是存在於我們語言的自身。我們只要能改變這點或那點細節，世界上馬上會有大批的人羣參加我們的事業的。』

這些思想把世界語領1894年的建議改造時期。

可是世界語者的大多數發現了那些建議的改造是無用而不必要的（參閱本書『柴門霍甫與世界語改造運動』一章）。

僅有『幾個很少數的不滿者，他們和幾個非世界語者而自以為對於國際語事業非常有權威的人們一起離開了世界語。在他們中間開始了直到現在還未休止而且永無休止的關於各種各樣語言細節的爭論。……』柴門霍甫很正確地稱這種爭論為永無休止的。因為只有實際的集體的應用與試驗，才能給予這種理論的爭論以結束，而這種試驗的唯一基礎——實際使用這個語言的世界語者——則遠非那些改造者與計劃者之能力所可企及。

在同一演詞裏，柴門霍甫證實着：

『當那些世界語者不再談及改造的時候，世界語便踏上了日益光輝的時期。開始的時候，我們在異常巨大的外阻力的壓迫之下，進展得非常遲滯而困難。』

以後，這個進展變為更為迅速了。可是還沒有達到足以使某個政府或科學界權威出而干預和決定關於這個語言之

改造的時機。如果世界語者自己來討論或決定這種改造，那不過在這個運動中，會招致分裂的危險而已。

所以柴門霍甫拒絕和那些沒有充分權力來接受國際語的代表們協商關於各種的改造。而在1908年一月十八日致各世界語者的公開信中也寫着：

『現在當我們還在過於幼弱的時期，我們只有嚴格的紀律與絕對的統一性，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

紀律是更加必要的，因為：

『那些自然語是完全平靜地去發展的，因為對於那樣的語言，沒有人敢作何種試驗或以個人的口味改變它；可是關於人造語，却每人都以為他有權利，「可以」而且甚至「應當」依照他的認識，來指示這個語言的命運。』
(註三一)

那麼，紀律與統一性在語言的實用上，也和語言發展之路的認識上是同樣的必要。

柴門霍甫時刻強調着，而且以各種方法保護着那最重要的國際語運動的前提——自由發展和實際使用——與不斷的試驗。

(註三一)：見1912年克拉科第八次萬國世界語者大會諒詞

柴門霍甫在國際語運動中的職務

具有極端謙遜與深切認識的柴門霍甫，他從來沒有自命過為這個運動的領袖，雖然那是由他所創始的。

在1888年他就宣稱過：

『我完成了這個語言基礎之後，現在要卸去我整個的職權了。這僅僅因為我深切地相信這個事業的利益要求我這樣作。』（註三二）

這可以找到證人的。他們敘述着，當柴門霍甫談及『第一書』發表的時候說；『就是我在這個時候死了，這語言也能不用我的幫助，而由它自身的基礎來發展的。』（註三三）

在1905年第一次世界語者大會宣言中，就宣布了這個語言有不依賴於任何個人的獨立性。

在華盛頓大會上（1910年），柴門霍甫又一次明確地說：

『要在這個國際語事業的自然進程中，來改易某種東西，我和其他任何個人是同樣無力的。』

1912年，在克拉科的第八次大會上，柴門霍甫辭去了在世界語運動中的正式職務。

R. Saussure —— 1913年第九次大會（Bern）的主席談到這個辭職的時候，正確地說過：『我以為他作得非常賢明，而且是為了我們運動的利益；因為如果從世界語者中即使選舉出一個最優秀者作柴門霍甫的繼承人或後任者，也可能招致不利甚或危險。（註三四）

柴門霍甫在國際語史裏的職務，已經扮演完畢了。從那個時候起，這一職務已經是屬於歷史的了。

我們應當像歷史家似地，把柴門霍甫——實際世界語運動的創始人——的特性表明出來。

我們一方面拒絕了甚至反對柴門霍甫整個政治哲學的觀念，但是却必須俯首於他的語言理想之前。那種統一於他的精神之中的理想，曾產生了偉大的力量。那些理想與力量，造成了堅強的國際語運動，而且實際地推翻許多在柴門霍甫之前的一些語言學家與語言理論家的觀念及理論上的假想。

我們還應該確認：世界語——這個柴門霍甫的主要巨作，在它的開始燦爛期，他那些拙劣的政治哲學理想甚或是有益的。在現實上，那些理想，如果要離開世界語之發展而考察便為次要而令人難滿的那些理想，它們却對這個語言曾作了某種勞績，作為它的良好，開始的酵母使用過。

由於他的堅執與深慮，柴門霍甫能在他的方案中，具體化了國際語能夠實在生存的一切必要的要求與前提。

那些要求與前提是：——

(1) 簡單與合理的文法；(2) 語文原素之具有國際性；(3) 自由發展及獨立的不依賴於任何個人的語言素材之增長；(4) 語言的實際實施與應用。

在柴門霍甫以前或以後一切人造語的計劃者，解決了的，僅只是這些前提中之一個或兩個，而柴門霍甫則解決了這四個之中的每一個。同時他的謙遜，使他能毫無痛苦而最不惹人注意地，從這個語言之命運與將來中，把自己分離開來。

國際語和世界語發展的原因，存在於柴門霍甫的語言理想中，在世界語構造內一些靈巧地組合起來的原則中以

及柴門霍甫的整個活動中。

在那些願意參加比現代更良好之社會秩序的再建，並願在這個再建中使用一切有用而適合的材料之社會與階層裏，柴門霍甫個人受到適當而應得的評價。至於柴門霍甫在克拉科第八次大會中發表的那樣演說：『假如對我個人，或我的政治宗教的原則感覺不適宜的人們，那麼他就是世界語的敵人。』這類的話從來不是向那些社會與階層講的。

柴門霍甫以他的語言巨作，已經為他自己和他的一生勞績，在人類進化史上建築下一座永難磨滅的紀念碑了。

(註三二)：“Aldono al la Dua Libro de l' L. L.” P. 12.

(註三三)：A. Zakrzewski, “Historio de Esp-o” Varsovio, 1913, p. 9.

(註三四)：“Esperantista Dokumentaro, Kajero xxx” Paris, 191. 4.
p. 96.

世界語函授學社

★ 常年招收各級學員 ★

世界語為科學的國際公用語，發音規則，文法簡單，學習容易，使用廣泛，國際聯盟及萬國郵電會等均曾通過決議正式採用；為欲認識世界文化、獲取世界知識、努力國際和平、促進民族平等者不可不學之工具。本社為遠近各地及在業人士學習便利計，初中前級均常年招生。初級畢業後能閱讀造句；中級畢業後即可翻譯寫作。兩級均六月畢業，有中文閱讀能力而志願學習者可隨時報名。

★ 供應各種世界語書刊 ★

本社為適應國內世界語運動之需要，數年以來努力於世界語學習用書，文學讀物及字典詞典等參考工具用書之編印。現已出版者，計有：世界初級講義（計三書），世界語文選（第一冊），世界語中文大辭典，現代中文世界語，世界語分類詞典，阿Q正傳，小母親，各國諺語選集，世界語歌曲集等；其他有關世界語之各種用書亦正在陸續排印中。此外並經售世界語文學讀物，雜誌多種。歡迎全國同志採購。圖書館講習班及購用書及各地書店批發均另有特別優待。

備有各級招生簡章總書
書刊目錄函索即寄奉

重慶三民路郵局對面

La 15-a libro
eldonita de KEL
柴門霍甫評傳
(ZAMENHOF)

版權所有

— ★ —

不許翻印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1—1000)

原著者	K.	Drezen
翻譯者	閔	凡
發行者	世界語函授學社	
	<small>重慶三聖宮郵局傳</small>	
印刷者	重慶自力印刷所	
	<small>民生路四十三號</small>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章程



1982